

中国新文化的基本品质与历史进程

朱寿桐

【摘要】中国新文化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吸纳外来文化的营养与资源，体现着亿万中国人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价值选择和人生倾向，并且以其特定的演进轨迹和发展成果丰富了人类现代文明。精神文化类型无疑是中国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决定新文化品性和质地的本体要素；制度文化类型是与精神文化类型密切相连的新文化时期社会文明范式的集中体现，它是新文化精神和品质的制度化规范化的结果。中国新文化的历史形态包含各个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包括新文化在各领域各个时期的文化成果。新文化的百年历程经过了“民主与科学”、“革命与自由”、“民族与民主”、“理想与斗争”、“改革与开放”、“多元和发展”等六大历史阶段。

【关键词】中国新文化 精神文化 制度文化 历史形态 澳门共识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7)01-0148-09

中国新文化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其伟大开端，在以罕见的强势和决绝姿态“告别”了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后，历经时代的风狂和雨暴，饱经岁月的辉煌与沧桑，伴随着中国人民和世界华人跨越一个世纪的艰辛与卓绝，光荣与梦想，成为近百年来几代中国人关系模式、人生方式、思维范式、行为方式和言论体式的品质与风格的呈现。中国新文化充分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精神营养，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承传了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因应着时代的节拍，体现着中华民族多元文明的质地，在当代世界人类文明的总体框架下独特而精彩地存在并发展，根深而叶茂。

百年的沧桑值得总结与回望，百年的辉煌需要讴歌与阐扬。汉语学术界从来就不缺少治史的热忱，但这样的热忱常常被某种价值忌惮和畏难情绪疏隔在中国新文化史编修之外。在中国新文化历史范畴内，许多历史的纷争和意识形态的现实差异无疑将限制历史述说和阐论的畅快淋漓，而文化内涵的无所不包以及外延的难以捉摸更会让审慎的研究者望而却步。但学术的延宕终究不能抵销百年文明的历史魅力。为这样的学术魅力所吸引，我们可以不揣冒昧，不畏艰辛，写下我们的思考与观察，写下新文化百年的史迹与传说。

中国新文化的品质

中国新文化是人类文化史上的杰出而富有生命力的存在。它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吸纳外来文化的营养与资源，体现着亿万中国人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价值选择和人生倾向，以其特定的演进轨迹和发展成果丰富了人类现代文明。

显然，几乎所有自然、社会、人文现象都可以用文化加以概括，或者加以描绘，甚至连自然的地质记录都已经用文化概念加以表述。通常意义上人们比较习惯于将文学艺术算作基本的文化现象，类似于许多政府文化管理部门所司职责的范围。但毫无疑问，人类的思想和学术无疑属于文化的重要内涵，属于人类文明结果的所有社会典章制度、宗教信仰、经济运作等，以及社会习俗，民风民俗的积淀，都是文化必然属性的体现。这些文化现象都是人类文明形成或创造的结果。文化，如果从汉语语词的构成进行解析，当表述为人类文明与开化的所有痕迹的总和。“文化只是‘人生’，只是人类的‘生活’”，不过是“集体的”、“大群的人类生活”而已。^①文化与人的活动相关，因而可以从人类文明和社会行为开化的意义上理解文化。

然而立即需要面对的问题是，许多自然现象也都被纳入了文化表述的范畴。既然远在人类尚未产生之前宇宙间就存在我们称之为文化的东西，这是否意味着，文化并不完全属于人类文明，它可以是自然的现象？可能的答案是，只有那些被人类的文明所认知、所理解并经过人类文明表述的自然现象才是文化的。宇宙空间尚有许多未被认知的天文现象，地质构造中也留有不少未解之谜，这些都不能纳入文化的表述之内。所有自然现象的文化表述才属于文化。在这一意义上，钱穆的观点值得借鉴。钱穆认为，人类的文化即便是在物质和社会生活层面的，也仍然包含着精神的因素，而且精神要素才是文化的本质。“若使人类没有欲望，没有智慧，没有趣味爱好，没有内心精神方面种种的工作活动参加，也将不会有衣、食、住、行之一切物质创造与活动”。^②

如果说人类文明可以被认为分别体现在自然、社会和狭义的文化这三个方面，那么，文化注定是人类文明的异称，是人类对自然现象的认知理解，对各种社会现象的观念表述，以及在思想学术文化艺术及其承载传播等方面的文化创意的结果。

这样，文化被自然地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文化的核心层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纯文化层次，在思想学术文化艺术及其承载传播层面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的文明形态。其次是概述层次，也就是社会法律制度，道德规范和宗教信仰等等，它们都体现为一种法规，一种约束，一种要求人们遵守的制度，虽然它们本身也许并不都以制度的状态出现。这种文化在重要性上远远超过文化，但作为观念概述又体现为文化的基本内涵。再次是物质文化，包括被理解的自然文化，以及各种人类物质创造的时代性理解。文化的本质是观念文明的痕迹与开化的结果。

钱穆在《文化大义》中同样阐述了文化的三个层次，分别是物质的（自然的），社会的，精神的，也就是物世界、人世界和心世界。^③这样的阐述大致准确。问题是，社会层面的文化也可能是物质的，如各种社会法律宗教设施等等，特别是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斯特恩（H. H. Stern）将文化分类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三个方面，似乎更有说服力。不过中文的翻译将斯特恩的第三层次文化表述为心理文化，显然缩小了这一分层的文化范围，应该作为精神文化进行理解和阐述。

文化代表着人类文明积累的结果，自身的构成非常复杂，物质文化必然包含且呈现出某种精神的内涵，才能够成为人们文化认知的对象，这便是如前所说的，自然文化中如果没有被人们文

明认知的部分，就不能算是文化，也不能进入文化的表述。同样地，即便是精神文化的类型，也必须通过一定的物质文化加以承载。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都是在相对意义上形成的某种分别。

但之所以作出物质的、精神的和制度的三种类型的划分，是因为在对文化进行学术把握的时候，需要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需要在诉诸人们文明思维的方法和途径方面进行类型学的概括。明确了此三种类型，便可以对一个民族某个时代的文化种类进行基本的结构阐释。之所以将钱穆所提出的社会文化修订为制度文化，是因为社会文化中既包含精神文化，也包含物质文化，精神与物质相对，但“社会的”类型在逻辑上无法与之并列。社会文化中包含着许多精神文化内容，也包含许多物质文化内容。从物质到精神类型，中间应该有一个介乎于其中的制度文化类型，它确实立足于社会层面，但既不偏重于物质也不纯然体现于精神，而体现为一种文化方法——调节和制约人类社会行为和价值规范的文化方法，包括政治、道德、宗教、法律、教育、习惯等等。

钱穆倾向于将物质文化或自然文化当作广义文化，而将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视为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由此，他将文化分为七个类别：经济、政治、科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④兼顾了他所阐述的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类型，但其间仍然有许多疏漏，也有一些混乱。例如，在精神文化类型中，思想文化、学术文化无疑是重要的文化现象，钱穆的概括中却忽略了这两方面的内容，而一般理论都倾向于将文学纳入艺术范畴，这里却主张在类型学上将其截然分开。

但钱穆作出了重要的理论开创，认为文化研究的重心，文化史研究的基点，应在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类型，而诉诸于精神层面的文化现象才是文化史研究的当然内容。在这样的意义上，他应该较少地涉及他所谓的“社会文化”，而更关注精神文化的多个方面。但从他现在框架设计中，社会文化如经济、政治、科学、宗教、道德等占据了文化类型的主要地位，精神文化方面仅仅涉及到文学与艺术，并未充分反映这种类型中更广阔的文化内涵。按照我们的类型分析，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每一种文化类型之中，又可以分为若干个文化种类。物质文化类型中，可分为自然文化、山水文化、天文文化、社会物质文化等。制度文化类型中，可分为政治文化、法制文化、道德文化、宗教文化、教育文化、科技文化等。精神文化比较复杂，又可分为三类别的若干形态。第一种类别是思想学术文化类，可包括思想文化、学术文化，这些文化都是创造性思考的结果，因而从文化建设方法上可以概括为创思文化。第二种类别为创作文化，是文学艺术文化，包括文学（当然文学可以归类为艺术，但在艺术创作中又占有突出地位）、音乐、美术、雕塑、戏剧、舞蹈、电影、建筑等。第三种类别为设计、传媒文化，这是一种创意性工作的结果，又可概括为创意文化，包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体现的设计文化，以及不断发展和更新的传媒文化等等。

精神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为核心的内容，也是最为典型的形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史研究，其最复繁难部分乃是精神文化部分，也就是创思文化、创作文化和创意文化现象。中国新文化及其历史研究也应侧重于这样的文化层面。

所谓中国新文化，是指中国近百年来形成的融入西方因素的文化潮流和文化成果。新文化以近代启蒙主义思潮为基础，与现代政治、思想、文化革命密切相联系，经过不同时期的运作、发展与调整，反映着现代中国人与传统相异的思维方式、语言方式及其支配下的生活习惯，生动地体现了从物质文明到价值观念、制度文化再到精神文明的世界化与现代性的文化轨迹。

毫无疑问，中国新文化百年的历史总结，必须紧密结合着关于中国新文化性质的理解与阐发。并非在现当代历史时期出现和活跃的所有文化现象都属于新文化历史研究的范畴。新文化必

须体现新的价值观，体现近代以来的西方化和全球化因素，体现现代性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与这个民族的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新文化从这意义上说，也割不断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事实上，如何处理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一直是新文化运作和运动的重要课题。但另一方面，鉴于新文化的发动是以否定传统文化为价值前提的，新文化的当然品质包含着相当浓厚的世界化、现代化的价值内涵，我们的新文化史研究应该立足于新质文化，尽管我们不可能完全认同甚至全盘接受新文化倡导时期文化精英们的价值理念。这样的新文化品质认定，使得我们势必将传统文化史学所必然包含的某些文化类别，如民俗文化等，从新文化史学研究中抛撇开去。民族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更为紧密，是长期形成并且在一定时间内难以真正改变的文化形态和文化方式，应该可以不算作新文化史研究的当然内容。

可以认同对文化的这样一种基本价值定位：文化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类文明与开化的结果，这样的文明与开化包含着鲜明强烈的观念和价值成分，因而其主要内涵在于精神层面。于是，中国新文化的历史研究和规律性研究主要以精神文化为主，部分涉及到体现现代中国人社会价值理念的制度文化，但基本上不涉及物质文化。尽管新文化中的物质文化也包含着许多新质成分，特别是社会物质生产的结果（现代产品，主要是工业产品），但由于它们并不强烈地体现新时代的价值文化和精神文化，因而也不宜在中国新文化史的学术叙述中占据显著的篇幅。

中国新文化的历史研究还必须从新文化发展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中国新文化百年的发展并不是在文化的所有方面都有同等的效力和成就，为了准确反映新文化的发展成就，突出新文化成就的主导方面，对于滞后发展的一些新文化类别与形态应采取学术兼顾的办法。具体地说，传统“八大艺术”中，美术与雕塑是并列关系，但新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实际显示，雕塑的成就及发展线索在新文化总体格局中尚不足以独立成一个构成部分，因而可以将其与书法并入美术类属之中。同样的道理，舞蹈也可以从新文化发展的实际出发并入戏剧类属。中国新文化发展过程中，建筑艺术从文化创作的意义上来评判，属于较为积弱的艺术文化门类，中国现当代建筑如果有值得进行历史研究的价值，则可能体现在它的某种创意性方面。于是，宜将新文化的建筑艺术部分从艺术文化的类型中抽绎出来，置于“创意文化”中的设计门类之中。

需要从中国百年来的新文化发展实际出发，对政治文化加以审慎对待。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我们的政治带着一种时代的刚性，它渗透到社会生活和物质文化的方方面面，一般不体现为一种文化形态（尽管文化内涵非常丰富），而是体现为决定人们价值观和意志力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形态。这种刚性政治不宜单纯从文化层面加以阐述。

当我们的历史叙述以中国大陆为本位（文化的空间属性决定了，我们必须以大陆作为新文化的核心地带进行学术阐述）的时候，有些必然的文化现象会以偶然的文化样态出现，譬如宗教文化。在叙述中国现代文化史的时候，宗教文化明显地呈断裂状态。

总而言之，从中国新文化百年历史的实际出发，从各种文化类型与新文化品质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来分析，精神文化类型无疑是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决定新文化品性和质地的本体要素；制度文化类型是与精神文化类型密切相连的新文化时期社会文明范式的集中体现，它是新文化精神和品质的制度化 and 规范化的结果。这两种类型构成了中国新文化的主体内涵。至于中国新文化意义上的物质文化类型，虽然同样有值得关注的成就与呈现，但毕竟并不直接反映新文化的本质属性，可以不被视为中国新文化百年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中国新文化历史及其学术结构

中国新文化的历史形态包含各个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包括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新文化运作，以及这种运动和运作的结果，当然还包括新文化在各领域各时期的文化成果。中国新文化史的各个领域、各个课题的各个历史阶段，都应该从相应的文化运动（文化思潮）或者相应的文化运作（文化团体性的作为）展开历史的陈述，在此基础上，突出本阶段在本领域最具标志性的文化成果，并充分揭示本领域在本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人。对于代表性人物和标志性作品，当然需要充分揭示其文化内涵，阐明其文化意义。

中国百年新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呈现出不同的时代主题，这些时代主题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新文化的主旋律，也可以说是推动新文化不断发展的核心动力。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正式掀起的1915年，到北伐战争兴起之际，这是新文化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此阶段以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和现代化为基本指向，突出的主题便是陈独秀概括的“民主与科学”^⑤。陈独秀明确将“民主”与“科学”概括为新文化倡导的主要内容，是在1919年年初代表《新青年》发表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其实早在《青年杂志》创刊之初，陈独秀就在宣言性质的《敬告青年》中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⑥这里的“人权”就是民主，陈独秀此时崇信卢梭的“人民主权”说，“人权”与“民主”实为一体：“人权”便是“群起而抗其君主，仆其贵族”，甚至成立“列国宪章”。^⑦不过这时期陈独秀心目中的民主更多地体现为现代价值理念，而不是政制设计。科学在这里代表着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以及破除迷信的现代人生态度和社会伦理。围绕着科学民主的时代文化主题，对新文化持保留甚至反对态度的文化思潮同样应该得到关注，并尽可能揭示它们的合理性，因为即便是反对新文化思潮的，往往在民主价值观和科学世界观方面也并非完全持反对的态度。学衡派虽然反对新文化倡导者的某些观念和作派，但他们标举的新人文主义同样包含有一定的民主思想和价值理念。学衡派同人刘伯明明确表示对于“德先生”的支持与赞赏，指出，“夫今之所谓德谟克拉西，非仅一种制度之称号，实表示一种精神也。”这种认识是非常准确的新文化观察，也体现着那个时代的新文化观念。不过他认为“德谟克拉西之形式，在吾国已略具矣，然求其精神，则渺不可得”，^⑧这实际上严重高估了当时中国民主政体的“形式”和制度的建设水平。既然“提倡新文化者”的批评者都珍惜民主“精神”，可见那个时代“民主”作为时代精神的普遍性意义。那是一个“德先生”和“赛先生”唱主角的时代舞台，各个门类的文化建设和文化倡导都以民主与科学的突出主题展示其自身的时代特性。

五四新文化思潮主要受西方文化思潮推涌而成，而成为中国新文化基本资源和推动力量的西方文化思潮，在价值构成和历史构成方面都呈现出较为杂多的态势。“民主”与“科学”仅仅是西方现代文化思潮中的代表性因素，偏重于解决现代思想启蒙中的价值观念问题。其他来自于西方思潮的一些价值命题也相当重要，如更为古老的“革命”、“自由”等，同样是新文化运动所乐意讨论和接受的关键词。“革命”本来是中国的历史名词，在宫廷政权非正常性更迭这样一种相当狭隘的意义上被使用，而自梁启超的思想启蒙到陈独秀的新文化倡导中，“革命”这一时代主题被理解为与西方意义上的政治社会积极性变革联系在一起，且广泛地运用于思想、文化、宗教、艺术等领域。梁启超发动的一系列文化改良运动，都分别被标示为“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等。陈独秀在他那篇著名的《文学革命论》中对“革命”作了

这样的夸饰性阐发 “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⑨他们赋予了“革命”这个本来带有某些贬义的概念以一种时代的褒义，并开启了几乎兴盛了整整百年的“革命”文化思潮。

西方现代思潮推涌出的另一个关键词是“自由”。它来自于西方价值观，“自由、平等、博爱”曾经被理解为西方启蒙主义的核心内容并且赢得世界性的追捧。陈独秀在《新青年》创立时期大力推进的“人权说”就包含着“自由”的当然内容 “思想言论之自由，某个人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在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⑩胡适、高一涵等在新文化倡导时期对自由问题都作出过相当系统、深入地阐述，胡适稍后甚至认为个人的自由与国家的根本利益直接相关 “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⑪“自由”在他们看来早已不是个人的人格问题，而是时代政治甚至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民主”与“科学”因其具有涵盖各种新潮观念的价值理性性质而成为超越性的时代主题；为其所涵盖的“革命”与“自由”则因为更多地体现为工具理性的品质，转而成为下一个历史阶段的时代文化主题。这个历史阶段的特征是新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相交合，新文化倡导的价值理性寻求通过具体的社会运作付诸实现，于是，“革命”既成为时代的文化符码，更成为时代的社会运作手段。“自由”既是个人发展的目标，也是社会价值和一定范围内政治意志的体现。因而可以将1926年至1936年的新文化运作，以及这一时期的文化主题概括为“革命与自由”。从北伐战争到左翼运动，新文化的时代主题便是革命。这既是政治和战争意义上的革命，也是意识形态、文化艺术领域的革命。这场连续性革命的目标是争自由，其中包括工农群众的自由诉求，以及知识分子的自由。革命的倡导者祭起的法宝便是“争自由”，对于“革命”持质疑态度的“自由人”同样标榜自由。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自由的时期，特别是在文化上的展开，都充分显示出自由的力量。

五四新文化运动铸成了中国新文化百年发展的几乎所有主题。与新文化母题相关的所有时代主题都只不过是不同历史时期新文化运作的时代任务的具体体现。1937-1949年，中华民族被拖进灾难的战争岁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无疑是一场民族的灾难，而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内战同样使中华民族和广大民众陷入了灾难。灾难中的呻吟，有民族反抗和自卫的呼声，有争取民主与捍卫和平的呐喊，新文化的时代取向是服务于现实，服务于危难之际的中华民族，此时代的新文化核心价值是民族与民主。共产党领导的延安等革命根据地，在那个时代显示出政治的独立性和独特性，但文化核心仍然是民族与民主。内战时期在民不聊生的情形下文化界对当局的抗争与谏议，也都集中于民主话题和民族自救的内容。

“民族”是近代历史时期一直困扰着知识界和思想界的核心命题，章太炎等革命家常常从“民族”问题着手鼓动民族革命，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中“民族”占据主导方面。每当国家的危亡成为时代的焦点，“民族”意识的高扬就会成为社会文化的显著特征。抗日战争时代的文化以“民族”作为精神主旋律，乃是情之所迫，势之必然。“民族”矛盾推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位置以后，对于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抗争迅速上升为中国的主要政治和主导文化，“民主”命题得以重新阐发。只是，这个时代的民主要求，较之于1910-1920年代的“德先生”，明显多了一些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要求。这是一种更为现实也更加具体的政治要求，这样的要求决定

了这一时代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文化内涵与品质。

1950年以后,以大陆为主导空间的中国新文化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受共产主义理想的引领、激励和阶级斗争主题的促动,“理想”与“斗争”,是这个时代文化运作的突出主题。新社会、新时代充满着理想的激情和对于未来的憧憬,这种为理想而奋斗的热忱一度表现为政治体制建设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人民公社建设,以及经济发展意义上的“大跃进”,文化建设以及其他领域里的“浮夸风”、“共产风”也一度非常流行。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进行“阶级斗争”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个发展,同时也是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种实践。阶级斗争仍然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社会政治主题这样的理论被总结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理想与斗争的联系就是本着这样的逻辑,主导这一时代的文化便是“革命理想”的激情以及“阶级斗争”的酷烈。

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这个理想与斗争的文化时代也才走向终结。不过这个时代所形成的左倾文化惯性并未立即停歇。

毫无疑问,1978年至1992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制度文化和社会文化方面的拨乱反正,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正本清源,改革被赋予时代伦理的正当性,开放成为锐不可当的时代潮流,其间经历的种种历史浪潮的回旋,终究不能阻遏历史最初向着四个现代化,后来向着小康社会不断努力脚步。1992年以后,历史进入到类似于后现代文化发展的时期,多元价值观念的形成,伴随着多媒体时代来临,这个一直延续到当下的时代文化以“多元和发展”为主题,持续地演绎着新文化的活力与精彩,当然也同时演绎着新文化的尴尬与无奈。各种各样的文化在继承新文化传统的意义上呈现出自身的多元与开放,不断地调整和制抑的呼声终究无法影响这种多元文化的发展。多元文化包含着许多劣质因素,但能够包容这样的多元就会有足够的定力克服这样的劣质因素。拥有这样的定力是我们这个时代新文化的风采与胸襟,拥有这样的胸襟意味着新文化历经百年的成熟。

中国新文化的运作以1915年创刊的《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为正式起点,2015年纪念新文化运动100周年的各项活动便成为文化热点。自4月份开始,全国各地包括北京、上海、济南等重要城市都相继举行了各种规格、各种专题的学术研讨会,隆重纪念、深入研讨新文化和新文化运动。9月14日,由澳门大学中文系和澳门大学南国人文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新文化百年纪念学术研讨会”,引起了海内外媒体和文化界的普遍关注。中新社对外发了通稿,全球一百多家媒体予以报道。^⑫此会议之所以有如此反响,一是汇聚了两岸四地有代表性的文史专家和文化学者,而且是非常集中地从两岸四地的历史、现实出发进行研讨,从不同的社会、学术、文化背景对于影响了一百年的新文化进行了深入、理性的探究,这样的交流能够体现出对中华新文化或汉语新文化的较为真切、全面的认知与反思;二是改变了一般学术会议议而不决的状况,达成了对于新文化认知的某种共识,作为会议的重要成果,发表了《新文化的重释与新倡》,^⑬俗称“澳门共识”,对中华新文化作出重新阐释并提出了新的倡导性意见,其中的关键词是:理性民主,科学发展,文明进步,多元和谐。

这四组词,可以说每组是并列关系,也可以说成是修饰关系。“民主”是新文化运动举为先导的一面鲜亮的旗帜,当时有一个高雅而十分富有美誉度的名字“德先生”,几乎所有积极的现代理念,如自由与平等,正义与公平等等,都可以在“民主”的理论框架内进行定位。但必须承认,民主的实践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有着千差万别的形态与体态,它们即便处在

相互矛盾甚至相互对立的状态下，也可能都以“民主”的面目出现。五四时代的“民主”精神，应该是一种时代的理性精神，用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的话说，是“诉之主观理性”的精神，它所吁求的是一种“自崇所信”的主体理性，是一种“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精神。即便是在现代民主体制已经基本建立的社会秩序中，这样的理性精神仍然是值得尊崇和倡导的。科学发展是一种当代文明的发展观，历史要前进，时代要发展，但这样的前进与发展不应该像陈独秀所痛心疾首指出的“恶流奔进”，而应该是带着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的良性发展。于是，即便是在历史的理念展开中，“科学发展观”也是对于中华新文化作出的一个重大的时代性贡献。文明进步的关键是要文明地对待各种文化传统和思想资源。我们今天常用的一个词是“与时俱进”，在新文化倡导者那里所用的一个词是“日新求进”，不进则退，事关民族的生死存亡。但我们的进步必须是有传承、有秩序的文明的进步，必须是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提下所取得的时代性进步。那种以偏激的态度否定和背叛传统而硬性推进的进步，实践证明有碍于文明的提升。文明的态度既然是以克服偏激为前提，则在对待异族文明和他国文化的意义上也同样应取尊重和科学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吸取其优良精华，剔除其恶俗糟粕。多元和谐是指新文化的活力在于它的多元性，在于它拥有开放、包容的文明范式，并通向和谐、协同发展的内在机制。不同背景、不同基质、不同资源和不同地区的文化，都能够在中华新文化的时代平台上协调发展，从而构成了中华文明新的发展秩序。^⑩

有关中华新文化的“澳门共识”体现出一种敢于对历史和现实负责的文化精神。从历史维度而言，“澳门共识”当然是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化精神，这是新文化的理性类型的表达。在这样的理念基调下，结合新文化百年来在不同地区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方面总结、提炼、补缀而形成了现在的格局。从空间维度而言，“澳门共识”的现实文化基础，就是不同区域的中华文明在新文化语境下的发展态势所构成的趋势。不同的政治区块，经过新文化的淘洗、炼冶，都能够在理性民主，科学发展、文明进步、多元和谐的意义趋于和洽，这是民族之幸，文化之幸。从现实层面而言，各地区的社会发展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也都面临着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而恰巧“澳门共识”恰好都能对这些突出的社会发展问题有所回应。

新文化发展拥有一个辉煌壮丽的开端，以《新青年》为核心叫喊出了时代的绝响。在它完成了百年历史的流转之后，应该具有本着时代立场发出的对于先贤哲言与功业的某种回声，尽管这回声可能非常微弱，但只要符合时代的理念，只要能得到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文化研究者的共鸣，就应该被理解为是新文化倡导之声在历史另一端的一种回声。历史也许会记录这样的回声，哪怕是作为对新文化倡导做出正面响应的一种努力与尝试，都应该成为文化史研究者所关注。毕竟，这样的回声具有这个时代跨越地域、跨越政治的代表性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已成为海内外纪念新文化百年活动的一个绝响，因而其对于中国新文化发展史应具有一定的标记性。

一种文化主流并不能取代甚至有时都无法掩盖这一时段同时存在的文化支脉。有时候，处在文化支脉上的文化运作可能比文化主流更具活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克服那种僵硬的思维方法：以为与文化发展主流相对立的就一定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思潮。新文化的宽容姿态和海纳百川的气概须经过相当长的历史历练才能形成，而一旦形成往往就是其健康、成熟的标志。有关新文化的学术研究也需要带着这样的姿态与气概。

总之，声势浩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了五四新文学，催生了中国百年前整个社会走向全面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并且直接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共产主义思潮的中国化。新文化的百

年发展,使得中国社会从思想上、文化上、政治上和生活上走出了古老的中国传统,并在西方“民主与科学”的现代价值观的引领下,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建构了自己的新文化传统。蔡元培等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充分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现当代中国的巨大意义。

全面总结新文化运动的成功经验,以便在今天社会主义建设新常态的情势下,尊崇新文化的伟大传统,分析和开发新文化的伟大传统,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与认识;对于新文化运动中的某些偏颇及其所遗留的问题,进行学理的解释和理性的检讨,使得新形势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更加科学。特别是如何面对优良的文化传统,如何理解西方价值观念的现代性与中国社会实际的适应性,我们须有清醒的认知。

合理地开发优秀的历史文化资源,建构新的文化品牌。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现代、当代历史积累了优秀的文化资源,这种资源在不同时期的开发利用,体现着中国文化现代化历程的重要规律。对这一规律的把握和描述,足以建立一种新的文化出版品牌。科学地整合现当代文化研究的优秀成果,打造当代文化最优范本。

将中国现代的政法、思想、学术、教育、传播、文学艺术等等置于文化分析的学术框架之下,有助于认清现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节奏与规律,为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当代文化提供足资借鉴的学术成果。文化是人类文明与开化的所有痕迹的总和。文化的核心层次,是在思想学术文化艺术及其承载传播层面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的文明形态。中国新文化是在与传统文化的复杂联系与挣脱中显现的历史形态,在思想学术的创造文化类,艺术文学的创作文化类,以及设计、传媒等创意文化类呈现出时代的风采。新文化的百年历程经过了“民主与科学”、“革命与自由”、“民族与民主”、“理想与斗争”、“改革与开放”、“多元和发展”等六大阶段的时代主题。

①②③④钱穆 《文化大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4、8、9、32页。

⑤陈独秀 《敬告青年》,上海 《新青年》,第6卷,1919年1期。

⑥⑦陈独秀 《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北京 《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⑧刘伯明 《共和国民之精神》,南京 《学衡》,1922年10期。

⑨陈独秀 《文学革命论》,北京 《新青年》,第2卷第6号。

⑩陈独秀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北京 《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

⑪胡适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香港: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第7~8页。

⑫汪沛 《新文化的重释与新倡》,《新文化的重释与新倡》,沈阳 《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第6期。

⑬陈汇 《朱寿桐谈‘澳门共识’的文化意义》,香港 《文汇报》,2015年11月23日。澳门 《澳门日报》,2015年11月18日。

⑭朱寿桐 《新文化的反思与前瞻——新文化“澳门共识”略解》,香港 《明报月刊》,2015年第11期。

作者简介:朱寿桐,澳门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韩 冷]

China's mineral rights , pushed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institutions in China , and comprehensively bolstered China's commercial war capability. The actions taken by the late Qing government facilitate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China. Although the people's perspective on economic nationalism , which is prevalent in the existing studies , is undoubtedly right , an official perspective is necessary in order to enric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late Qing dynasty.

(4) The Basic Quality an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New Culture in China

Zhu Shoutong • 148 •

The new culture in China is found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 and absorbs plentiful elements from foreign cultures. It embodies the value and the life tendency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 particular situations , and facilita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civilization. The core of the new culture in China is the spiritual culture , which decides the quality and the essence of the new culture in China. And the institutional culture reflects the civilization mode of social life in the era of the new culture in China. Over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 the new culture in China has experienced six periods , each characterized by different topics , namely: "Democracy and Science," "Revolution and Freedom," "Nation and Democracy," "Ideal and Struggle," "Reform and Opening up," "Multiculture and Development. "

(5) The Metaphor of Modernity in Green Lifestyle: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CGSS2010 Data

Zhao Wanli , Zhu Tingyu • 195 •

Th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social changes are based on people's ideas and behaviors. Using the data of CGSS2010 , and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lens of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 this article examines which factors have an influence on an individual's decision to adopt a green lifestyle. We find that people who have a stronger sense of self-identity , pay more attention to mass media , live in cities and spend more leisure time reading are more likely to adopt a green lifestyle. However , the work experience and th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have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decision to adopt a green lifestyle. It suggest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ty leads to an increase in people's self-efficacy and a change in the way people access information. People thus are encouraged to rethink modernity problems , and reflexive modernity contains the potential fo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6) Improving Government Legal Counsel System

Yang Weidong • 224 •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 the government legal counsel system , it is necessary to reform the system. First , the government legal counsel should be changed from a titular position to a real-power position ,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influence of the position. Second , the function performed by the government legal counsel needs to be changed from a remedial one to a precautionary one , in order to expand the function of the position. Third , the government legal counsel should be changed from a part-time to a full-time position ,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service by the holders of the position.